书而思

推动改革需要考虑的几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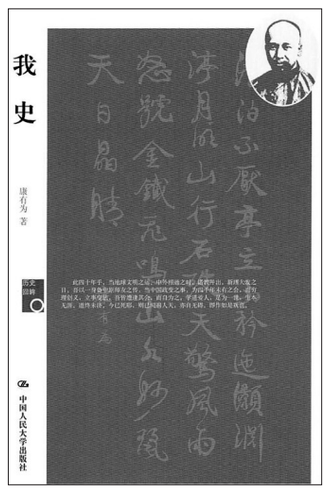
□卓泽渊

康有为作为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为中国的改革事业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在中国的改革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他积极倡导和参与的改革——戊戌变法失败了，甚至惨败。其原因何在，历史上已经有很多解读。近日读得其《我史》一书，大有茅塞顿开之感。综观其记述，我以为除了改革方案是否科学可行等之外，至少还有以下几个外在因素，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

利益受害者的反对。改革总是对利益进行调整，重新分配。即便改革的最后结果是多赢的，但是在改革之初或者改革过程中，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受害者与自认为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往往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或者破坏力量。他们会消极对待改革，甚至动用一切力量来抵制改革，必要时不惜否定改革和摧毁改革。在戊戌变法中，这是一个极其典型的问题。当年康有为倡导废除八股考试，在今天看来，也许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在当时可是伤筋动骨的大事，也是许多人的切身利益所系。根据他自己所述，在他的主导下，“科试均废八股而改策论矣”。“时八股士骤失业，恨我甚，直隶士人至欲行刺”。甚至有人建议他“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我相信康先生所述是实。当时，因八股而得以晋升的人，会以为自己的根基被动摇了，会心神不定；以教授八股为生的人则被敲碎了饭碗；假如有为八股考试出复习资料、进行考前辅导的人更会对其恨之入骨。就是那些平时十分痛恨八股的考生，其中个别人，眼看八股被废，也会觉得自己的八股水平足以让其蟾宫折桂，但是现在希望被康破灭了，也自觉与不自觉地将康恨了起来。不仅是八股的既得利益者，就是错误地以为自己是将得利益者也会愤愤不平。于是他康有为就犯了众怒。旧体制、旧机制的得益者、将得益者、自认为会得益者都不会放过作为改革家的他，确也可悲。

改革方案被畸变。一套原本不错的方案，三下两下就被变味，畸形变化得连改革者本人都不认识，大呼出人意料、无法预料，远非其本意。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早就有一整套改革方案，至少他本人是这么看的。改革伊始，他就向皇帝提出：“请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别开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商局、工局、矿务、铁路、邮信、会社、海军、陆军十二局，以行新法，各省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结果如何呢？他自述是：“所云誓群臣、定国是一条，以为诏书两下，国是已定，此条无庸议。所请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一条，乃改为选翰詹科道十二人，轮日召见，备顾问。于是制度局一条了矣。我所请令臣民咸得上书一条，改为职官递本衙门，士民递都察院。我所请开法律局，定为每部派员司，改定律例。夫官员无权无才，无从定之，又非采集万国宪法，与我本意大相反矣。学校局一条，则以大学堂及各省中小学堂已经奉旨另办了之……于是所议，我折似无一语驳者，似无一条不行者，上亦无以难之。虽奉旨允行，而此折又皆成为虚文也。”整个改革方案似乎都实施了，其实都被畸变了，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实施。宏大的改革方案几经转换，顿时化为无形，确也可惜。

既有体制与官僚之作梗。改革总是在既有体制上启动，实际上是在旧体制基础上由旧官僚来推动的。这就为改革的失败埋下了伏笔。综观整个戊戌变法，我们不难发现，康有为先生等改革家所做的，主要是写折子的工作。改革的推进主要是靠皇帝认同而发圣旨。所有圣旨的执行都交付给既有的体制与官僚。这些圣旨在实际上执行与否，乃至执行的多少都决定于既有的官僚和官僚体制。既有的官员几乎都是既有体制、制度的获益者，改革无异于断了他们的根基、财路、生计。按照既有轨迹满可预期的前程，顿时变得不可预期了，他们难免会心生惶恐。即使未来对于他们可能更好，他们也会基于习惯和惯性的原因而对改革心生抵触，乃至置之死地而后快。体制不动、官僚不动，梦想依靠既有的体制和官僚而达成改革之目标，实乃妄想。这不能不说是戊戌变法必然失败的宿命，确也可叹。



我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和感悟

——领导干部主题征文启事

中共中央党校是培训轮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的最高学府。每年，大批在职高中级领导干部以学员身份汇聚于此学习提高，这是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举措，关乎党和国家的长远大计。

许多领导干部通过在中央党校学习，增强了使命感紧迫感，强化了问题意识，加强了党性修养，把握了基本理论，开拓了世界眼光，提升了能力素质。为了进一步推动学习型政党建设，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适应新常态、提高新本领，《学习时报》特举办“我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和感悟”主题征文活动。本次活动主要面向正在或曾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具体事项如下：

体裁字数：议论文叙述文等文体均可，一般不超过6000字。

内容要求：1.作品必须为作者真实的体会和收获；

2.来稿请注明作者的工作单位及联系方式。

征稿时间：见报即日起至2015年3月31日止（以邮戳为准）。

征文评选：征文截稿后，本报将评出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20名。获奖文章将在《学习时报》及中央党校报刊社其他媒体选登。优秀文章还将结集出版，相关图书向全国副省级以上党校等单位赠送。本次征文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投稿方式：

1.征文请邮寄至：北京市海淀区中央党校南院报刊社 邮政编码：100091

2.通过邮件发送至：xuexishibao99@163.com

联系人（收件人）：李少军

联系电话：010—62806049

好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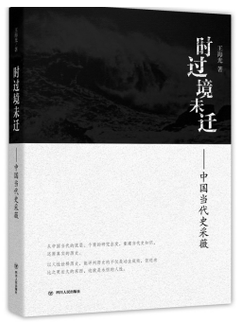


书名：《萧公权文集》

作者：汪荣祖、黄俊杰/主编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

编者谈书：这套《萧公权文集》共9卷，收录了萧公权生前公开发表过的《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康有为思想研究》《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等绝大部分中英文著作、论文以及一部分没有发表过的讲义、讲学提纲和文稿，集中体现了萧公权政治思想和学术成果的整体风貌。这套文集的出版无疑为中国政治学、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套权威、客观、宝贵的文献资料，既是对萧公权本人一生学术研究的系统梳理，也是对20世纪中国政治学研究、思想史研究的一次审视与回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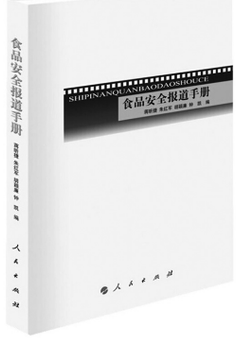


书名：《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

作者：王海光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

编者谈书：本书探讨了当代史治史的考据、文章、理路等问题。文集中的文章有史有论，有点有面，有述有评，有考有证，内容丰富，笔法严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出台的制度背景、反右、“文革”等中国当代史中一些重要问题，书中均有涉猎。“评判历史是要讲述功业成败，但还有比功业成败更长久的东西，这就是永恒的人性。”作者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



书名：《食品安全报道手册》

作者：蒋昕捷 朱红军 胡颖廉 钟凯/编

出版：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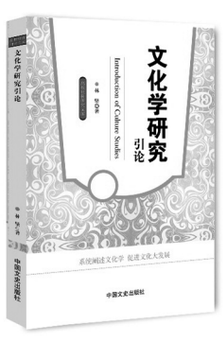
编者谈书：食品安全问题是当前最受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本书由多位知名媒体人、学者、科学家共同撰写，通过大量一线采访调查，深入报道了近些年来百姓关心的食品安全事件。作为深度调查，文本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权威性，但写作方式却由浅入深，在轻松阅读的同时即掌握大量食品安全的相关知识。该书完全可以是政府了解当下中国“舌尖上的安全”的最客观、最全面的一手资料。

书名：《文化学研究引论》

作者：林坚

出版：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3月

编者谈书：本书力图较全面地分析文化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艺术、宗教等的关系，系统阐述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提出文明体系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人的文明。独创性地探索文化多样性与个性、文化整合、文化创新与创新文化等。该书在体系结构上有创新，史论结合，特别注重把握文化与相关领域的关系，对文化学与其他学科的互通关系做了较为明晰的论述。



工业化超前 城市化滞后

□周其仁

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在理解上，这一点没有特别的困难。工业不同于传统农业，技术上不靠光合作用，不需要每部机器、每道生产工序都均匀地晒到太阳，所以可以在空间上集中，也需要通过聚集来节约基础设施的投资。此外，工业产能大幅度提高之后，产出有了革命性的增长，需要更发达的分配体系，一般也会刺激市场和商业中心的发展。

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推进工业化的难度很大，因为长期以农立国，工业化的资本、技术、人才门槛太高，难以逾越。比较之下，“城市”却是老早就有了的。发展城市也没有什么名堂，似乎工业化之后，城市化自然就会加速。倘若工业没有长足的进步，“消费性的城市”再多，对经济也没有好处。由此，前辈学者皆重工业化。

中国的工业化历经艰难曲直，终于在全球搞出了名堂。比照之下，倒是原先普遍认为门槛不高的城市发展，成为落后于工业化的一条短腿。本文标题——“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讲的就是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相匹配的现实，其中包含的经济逻辑，值得深入探查。

先简要交代一下，衡量工业化的水平，关键指标是“工业化率”，也就是工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城市化呢？当然是“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这两个“率”，一个经济，一个人口，当然无从直接比较。不过，由于工业活动总要“投影”到人口的空间分布上，所以在经验上，以上两率又可以作统计上的比较。

让我们先从最新的数据看起。今年国家统计局宣布我国城镇化率51.3%，那是2010年人口调查的结果。同年的工业化指数是多少呢？46.8%。这是说，2010年我国不但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且城镇化率也超过了工业化率。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不过拿全球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工业化率相对于城市化率而言，还是偏高了不少。用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全球平均的城市化率为50.9%，而工业化率不过26.1%，而中国的两率的比值是1.09（即城市化率/工业化率=51.3%/46.8%）。全球的平均比值是多少呢？1.95（50.9%/26.1%）。中国的工业化率相对全球平均水平高出了近一倍，统计口径的细节差异就不重要了。从大的图像看，中国工业化推进的城市化率的提升，远远不及全球平均水平。

与发达国家的区别就更为显著了。201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工业化率为4.1，即城市化率高达工业化率的4.1倍。同年同一比值，法国为4.11，英国为4.09，德国为2.64，日本为2.48，共同呈现出城市化率远远高于工业化率的特征。即便是“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城市化率除以工业化率的比值也分别达到3.22、1.97、1.38和1.15，都比中国的高。

不可小看这个比值。讲过的，工业化活动引起人口分布的改变，在空间上总有相应的表现。城市化率大大高于工业化率，描绘的是随着工业产出占总产出比重的提高，会有高得多的比重的人口居于城市。这幅图像背后，有规律在起作用吗？

让我援引道格拉斯·诺斯的一项研究成果。这位后来以制度变迁理论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早年是研究美国经济史的。1988年他与一位合作者发现，在1970年美国的全部产出中，来自交易部门的贡献高达46%~55%，比一个世纪前的美国状况——交易部门贡献了26%的总产出——整整提升了约一倍。这与经验的观察很一致，就是与“发展中的美国”相比，发达后的美国有更多的人力资源从直接生产部门转移到“交易部门”工作。后者通常聚集于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比工业化率有更快的提升。

研读这项发现的时候，我问过一个问题：如果交易部门不是比工业生产部门更发达，美国还能拥有世界第一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吗？答案是否定的。没有更发达的交易部门，工业品无从在市场上实现转手，很快遭遇“产能过剩”，那就再也谈不到继续发展了。毕竟，工业生产流水线的技术进步可以很快，产出的规模也可以迅速翻番再翻番，可是，打通市场的“技术进步”一般就没有那么快了。简言之，是无数的“推销员之死”，才成就了现代工业革命的。

受此认识的提点，我对交易部门相对更快的增长，多少有了点敏感性。1996年回国，“下车伊始”的当晚，我就前往济南看一家洗衣机厂，对这家当时生产规模不大的制造业公司要向几十个城市派出庞大的销售、服务和修理团队，印象极为深刻。1998年有机会访问TCL，一位副总介绍他们遍布全国的营销人员总数远比车间工人多得多时，我就不觉得那么吃惊了。交易部门的加速扩张，是工业化进步的可靠征兆。

可是，就整体而言，中国还是上述经济规律的一个反例。不是吗？作为当今全球总量第二大的经济体，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总量为18.8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78万亿美元），占据全球工业总量中的最高份额，也说明“世界工厂”名副其实。可是，若论工业化推动交易部门的更快增长，以及其空间投影——城市化率更显著的上升——中国却不但敌不过美欧日本，甚至在金砖诸国中也甘居下游。这里冒出来一个谜：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率更快增长这个规律，为什么在中国的经验里失灵？

我的看法，谜底在于开放与全球化。今天的中国工业为全球市场供货。但是，中国制造的工业品之所以大步流星地走向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世界城市体系”的帮助。离开了香港、新加坡、首尔、东京、法兰克福、汉堡、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伦敦等世界城市的商务、物流、技术和融资等多方面的服务，中国制造要坐上天下出口的第一把交椅，应该没有那么容易。

看来，内地企业的“借船出海”，首先是“借城出海”。世界上当然没有白借这回事，服务费总是要付的，学费也不能不交。来来往往之间，中国制造刺激了境外交易部门的繁荣，推动了相关经济体的城市化更上层楼。我们要明白，今天发达国家的城市，服务的可不仅仅是他们本国的实体部门，这些声名远播的世界城市中心，也为中国制造提供服务，并在服务扩展中成长。

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中国内地交易部门的更快增长。投影到空间表现上，中国的城市化率就没有表现出相对于工业化率的更快提升。虽然自己和自己比，近年内地的城市化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甚至有人认为已经偏快了。可是拿全球的情况作为参照，迄今为止，我们还是可以在中国现状中看到“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本文要说的是，经济规律未被违反，只不过是开放与全球化不再让它显示在单一国家的账面上。

摘自周其仁《城乡中国》（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版）

书摘

书海泛舟

借书趣事

□吴小毛

据史书记载，早在两汉以前，读书人已开始相互借书。那时，在藏书人与借书人之间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礼仪。即借书人在向藏书人借书时往往以一瓿（音chī，古代陶制酒器）酒相酬，还书时又以一瓿酒相谢。古人谓之“借书一瓿，还书一瓿”。

在活字印刷尚未发明、雕版印刷又不普及之时，图书对于读书人来说，其宝贵程度不言而喻。正是由于书籍得之不易，读书人才格外珍视，不肯轻易借人。不论是后世演绎还是误传，“借书一瓿，还书一瓿”到魏晋时期便演变成“借书一嗤，还书一嗤”。此说后来又被人演绎为“借一痴，与二痴，索三痴，还四痴”。唐人杜暹在其所藏之书皆钤“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之印，希望子孙善守先人手泽，勿借勿卖，否则便是大逆不道。明代范钦为其天一阁藏书楼立下“书不借人书不出阁”的家规。明朝的陆容在《菽园杂记》中则干脆说：“以书借人，是仁贤之德，借书不还，是盗贼之行，岂可但以痴目之哉。”

近代，书籍成为一种普遍之物，再也不像古代那样珍贵难得，但即便如此，借书同样是一种大忌。围绕借书，发生过许多饶有趣味的逸事。

胡适晚年颇为得意地说，我一生向人借书从来没遭过拒绝。之所以会如此，是与他乐善好施的品行相关。胡适听说某人在做什么研究之后，便主动将自己的独家书籍资料借给对方。周汝昌就曾回忆自己年轻时少不更事，竟向胡适提出借用他所藏世上唯一一部无价之宝“甲戌本”红楼梦。不想，胡适居然真的借给了他这个素昧平生的穷学生。胡适不但让专人将此书送到周汝昌手中，而且此后从未催问。要知道，胡适去台湾时唯一带走的一本书就是这本“甲戌本”红楼梦。此后，这本书在北美红学会上展出时，仅保险费就高达数万美元。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常将书借给学生。当时文学系的学生几乎人人手中都有一两本沈从文的书。对此，沈从文从来不记在心上。但是，沈晚年在致友人的信中也曾有如下抱怨：“最感到无办法的，即我充满好意与热心，把一些重要资料借人后，收不回来，可谓糟糕之至！……又能有个什么办法，使得那些借用我材料的朋友，也能回报我的好心，能一一把借去的图书资料见还。”

与胡适、沈从文的慷慨不同，周作人对书异常吝啬。他和鲁迅反目后，将鲁迅的许多书据为己有，不许鲁迅搬走。晚年他又教诲子弟不要将书借给别人。

1954年，毛泽东派田家英到北京大学借阅北大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红楼梦》。田家英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来到北大校长办公室，副校长汤用彤亲自打电话给馆长向达，说毛泽东借书之事，没想到竟被向达拒绝。向达的理由是：善本书不能借出，这是图书馆的规定。要用可以复印可以抄，就是不能借。事情一时陷入僵局。最后，在田家英和汤用彤的反复努力下，向达同意破例借书。但是必须一个月之内归还。结果，毛泽东很守信用，第28天就把书还了。